

开展一次教学方法的大改革

——在“首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的讲话

周远清

非常高兴参加首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论坛因《中国大学教学》杂志而得名，论坛名称是我替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杨祥同志最后确定下来的。希望经过若干年的努力，“中国大学教学论坛”能够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个知名论坛、名牌论坛，各个学校有好的教学经验、想法都希望到论坛上交流；希望得到新思想、新经验的学校也可以到论坛上来获取。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改革开放对中国高等教育来说非常重要。我本人不算是最近30年而是最近十几年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见证者或者参与者。最近我常常思考如何概括改革开放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我用“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程。在高等教育大发展的过程中，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陈至立同志在2007年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咨询工作会议上提出，要加快从高等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迈进的步伐。2008年初，中央科教领导小组决定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到2020年，我国有三件大事。第一，党的十七大提出，到2020年我国将全面建设成小康社会。所以，规划要回答好把什么样的高等教育带到小康社会，或者是小康社会要拥有一个什么样的高等教育的问题。第二，到2020年，我国要跻身于创新型国家行列。创新型国家是世界各强国在发展道路上的选择。现在世界上有二十几个创新型国家。我国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也确定下来要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高等教育责无旁贷。第三，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要比2008年年翻一番，这是一个伟大而艰巨的任务。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宏观经济社会发展背景非常清晰。所以，高等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的实施，将为高等教育提供一个新的发展平台，会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

最近十几年以来，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经验是什么？或者说应该沉淀出什么东

西？经过一段时间，我总结为四句话：第一，开放是前提；第二，改革是关键；第三，质量是中心；第四，理念是先导。不一定对，今天提出来供大家讨论。

一、开放是前提

高等教育战线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单位。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小平同志在听取关于清华大学汇报的时候就明确提出，我们派留学生出国学习要成千上万地派，而不只是十个八个地派。这一点对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最近陈至立同志在《教育大国的崛起》这本书的序言里写道：以小平同志亲自作出恢复高考及对外派遣留学生的重大决策为起点，中国教育迈出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步伐。1978年下半年，我国就组织了一支庞大的队伍到美国商谈如何派留学生，加强与美国教育的交流合作。所以中国高等教育是最早对外开放，可能也是最早受益的战线之一。很多数据我过去都提过，比如，我国80.49%的“两院”院士，77.61%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71.65%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教学研究基地主任，94%的“长江学者”，72%的国家“863计划”首席科学家都是留学回国人员。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现在落户清华大学；图灵奖获得者姚期智先生放弃美国的职务到清华大学搞教学、科研，办了一个计算机实验班；陈省身先生落户南开大学（可惜2004年他去世了），成立了刘徽数学研究所，盖了一万多平方米的数学大楼。这些事在15年以前都不可想象。2001—2006年期间，清华大学共有61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来访，他们不是来游玩的，而是因为我们交流的空间、交流的项目和交流人员。2001—2006年，清华大学还有许多外国国家元首来访。清华大学日常有800多人次的境外专家、教授参与教学科研活动，其中有45%的人参加了教学工作。中国多年来的改革非常平稳，这与我国的对外开放有密切的关系。我们进行的很多改革实际上是在开放以后学习了国外成熟的改革经验后才推

周远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教育部原副部长。

进的。我们在主要发达国家都成立了教育处。我在任时，每次驻外人员出国前，我都要向他们介绍我国高等教育的情况，并委托他们长期跟踪所在国家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动态。后来，有好几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动态都被他们报送回来了。所以，我认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得益于开放。

中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要建立一个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我想至少有两条：第一，要在人才培养上要更多地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在学科上、在科学研究上学习了国外的很多经验，也很有成效，今后更加开放的高等教育需要更多地学习国外的人才培养经验。现在一些重点院校已经意识到这一点。把最好的学生送到国外最好的大学去培养，这是近几年一些重点大学流行的说法。比如，这几年，清华大学13%的本科生、浙江大学1/6的本科生在学期间有出国留学的机会。清华大学每年要派60位中青年教師到国外进修，国外也有很多教师来清华大学参加教学和科研工作。清华大学提出面向世界建设人才培养平台，我觉得很好，有三种情形：一是充分利用世界上的资源，例如61位诺贝尔奖得主、400多位大学校长和副校长来访，其中有种种内涵可以帮助学生拓宽、拓展素质教育。二是通过与世界很多知名企业建立联系，学生可以到这些国外的企业进行不同程度的实习、参观、拓展训练。三是派学生到国外攻读学位，过去送研究生去培养，现在也应该把最好的本科生送出去培养。所以进一步开放非常重要，我们要学习国外在人才培养方面的好经验。当然，国外的经验也不全是好的。

第二要加强文化交流。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或者教育、科学研究的交流，从根本上来讲是文化的交流。当年在讨论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时，我提出文化素质应包含文史哲的基本知识、艺术方面的基本修养以及我国和世界的优秀文化。张岂之先生后来多次说过，当年对文化素质教育内容的定义到现在也没有过时。进一步开放，要加强其他国家优秀文化的学习。国外的优秀文化与中国的优秀文化一起构成和谐文化，这将使我国的开放取得更大的成绩。

二、改革是关键

高等教育的发展归功于改革。这方面的例子很多，大家都能感受到。我国高等教育之所以能发展到世界第一的规模，其中很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学生交费。我曾与一位英国著名教育专家交流。他认为大学收费改革是件非常困难的事。英国高等教育以前并不收学费，直到最近几年才实行学生收费改革，且幅度不大。收费以后5年之内媒体议论纷纷，批评很多。他问中国为什么收费？我说理论上站得住，实践上有可能。什么叫理论

上站得住？因为高等教育属非义务教育阶段，非义务教育是可以收费的。他问收费之后高等教育是得到了发展还是受到了抑制？我举例说明。我国在校大学生数，1995年是640万，2005年是2300万，2007年是2700万。中国高等教育之所以发展这么快，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实行收费上学。这几年，在高等教育经费中，学费约占30%，政府投入占40%多。现在有些学校的经费是政府投入占20%~30%，学生收费占70%。当然这里也有教育“产业化”的流毒，今天不予置评。高校如果不收学费，银行也不会向高校贷款。所以，如果没有改革，我们将很难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对于高校由于贷款形成的债务问题，各级政府正在研究解决。如，广东高校的债务，全部由省政府“买单”；最近，江苏省也在研究为高校债务“买单”的问题，江苏如果也全部由政府“买单”，那就会又带个好头。最近，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大内需的措施，国家在今后两年内将投入4万亿元资金用以支持企业的发展。其实，投资教育是最稳妥的，如果国家能拿出其中的2千亿元投到教育，帮助高校解决贷款债务问题，那将是功德无量的。希望大家一起呼吁。我们承认，这几年扩招后中央政府和部分省市按照“两个增长”的要求增加了教育拨款，但大部分地区并没按生均指标相应增加教育经费。

2008年，国务院采取大部制，部委合并调整为28个。国务院各部委的调整是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大部制改革可能还没有到位，今后还会调；但即使部委机构再调，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也不会再有大的调整了，因为高等教育已经进行过管理体制的改革。当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我们对中央各部委直属的学校进行了管理体制的改革（只有国防科工委所属的7所学校未调整）。在高度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形成了由国家包办高等教育，统一招生、统一分配的体制。不进行改革，中国高等教育的很多弊端就不能革除。过去进行高等教育改革，我们提出，“体制改革是关键”。现在如果综合看或整体上看，我认为改革是关键。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归功于改革。

三、质量是中心

多年来，在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质量是中心”。当年在改革的过程中，有的教育专家曾批评我们重视体制改革，忽视教学改革。事实上，当时我们已经提出“体制改革是关键，教学改革是核心”。在改革过程中，一方面进行体制改革，一方面进行教学改革（一直到现在实施“质量工程”），在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没有忘记教学改革，没有忘记提高教学质量，因为这是最根

本的。当年我们有很多口号，如“教学改革是核心”、“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提高质量是学校永恒的主题”、“不重视教育质量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等，都是大家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经验。提出这些口号，甚至于提出“教务处是天下第一处”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希望引起大家重视。如果一项改革最后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就不能说这项改革是成功的。任何时期都要把质量放在中心的位置，没有质量标准或不以质量为中心的改革会误入歧途。最近有一些值得关注的提法，我只讲其中两个。

第一，关于“高等教育大众化”。我国学者根据马丁·特罗的学说，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15%，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我认为这是对的。但一些提法，如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走向了“大众化教育”，我觉得这个提法不妥。类似的提法还有，比如从“高度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这两个提法都有否定前者肯定后者的意义。从“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否定应试教育，肯定素质教育；从“高度计划经济”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肯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否定高度计划经济；笼统地提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我个人觉得也有否定“精英教育”肯定“大众化教育”的嫌疑。前段时间国务院讨论建设第三期“211工程”，要投入100亿元，就是要支持精英教育的。我国的“211工程”和“985工程”，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如果我国推进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话，就有可能使“211工程”、“985工程”和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变成中国做强高等教育之路，甚至是强国之路。高等教育强国与“211工程”、“985工程”不完全一样，它不完全是个重点工程，它是要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有强项，并且要做强省一级高等教育。“211工程”和“985工程”在国际上反响很大，日本后来也搞了一个“卓越行动计划”。2008年，日本有4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舆论认为这是“卓越行动计划”的成果。德国和韩国也有类似的重点建设计划，这些都是精英教育的范畴。精英教育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综合实力的表现，千万不能忘记。在讨论精英教育和大众化教育的时候，我个人认为既要重视精英教育又要重视大众化教育，精英教育要引领大众化教育。

第二，关于评估。前一段时间的评估，百分之七八十的学校，包括一些办学历史不长的学校都被评为“优秀”。现在，本科教学的质量还有很多问题，如果一些基础不太好的学校拿“优秀”自我欣赏，自认为本科教育已经搞得不错了的话，我觉得这可能会带来负面影响。前一阶段，新世纪教学研究所做了个调研，发现一所重点大学的学生到课率只有70%；学生对教学反应最强烈、意见最大的是教学方法问题。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学生对

教学方法提出尖刻的意见。所以，首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的讨论主题是教学方法，也是我多次向杨祥同志的建议。教学方法的改革应该提到日程上了！

高等教育在大发展后如何提高质量？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问题着手。

一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1949年以后，我们自己培养了一批数量可观、质量很高的教师。在搞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的时候，我曾经说过，我们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有一批老先生、骨干教师将退未退。“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很多都有这些老先生、老教师的参与。2005年以来，高等教育出版社与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教学研究会联合举办了30多场大学基础课程的系列报告论坛，我参加了其中的十几场论坛，见到了一批解放后培养的老先生，大家的积极性都很高，但是都退下来了。这几年我们进了一大批教师，据有的教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听课课后反映，不少教师课堂教学几乎堂堂都有错误。这种状况令人担忧。所以，建设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可能是高等教育质量进一步大提高的最重要任务。最近，刘延东同志对建设师资队伍的问题很关心，我认为国家今后对教师队伍建设将会更加重视，给予更大的支持。

二是教学方法改革与创新的问题。如果说，对中国高等教育质量的评价，社会上和高等教育界可能还有不同看法的话，那么，对高等教育的教学方法的批评则是众口一词，没有分歧。中国从幼儿园、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都实行灌输式教育，多年来没有大的改进。中国高等教育的教学方法太死，把所有学生都培养成一个模样，压制甚至扼杀了学生的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创造性。这种教学方法怎么能培养出学生的创造性？我们进行过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招生与就业改革、收费制度改革、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教材改革，也进行过专业调整。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绩，大家有目共睹。因为当时各项改革的任务很重，教学方法的改革一直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所以当年我就讲，总有一天要来一次教学方法的大改革。这一天现在是不是到了我说不好。所以我建议要来一次教学方法的大讨论、大改革。

在这里我想请大家一起思考：当前教学方法的改革是不是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在中国高校，启发式、讨论式的教学方法一直难以真正推广，大家还是习惯于灌输式教学。教学方法之所以一潭死水，就是因为受制于落后的教育思想观念。所以教学方法的改革也需要有先进的教育思想为先导。另外还需要有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来推进，因此，我们要重视教师培养，重视师资队伍建设。（下转第13页）

和地位。报告指出,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沟通和表达技巧、商业及管理科学对于工程师培养具有更重要的作用,或者至少与技术教育的地位同等重要(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2004)。关于通识教育之于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回顾教育发展史并不是新事物。但是,《2020工程师》将通识教育强调得如此重要,是值得注意的。确保通识教育在高等专业性教育中的基础性地位,是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普遍趋势,也是高等专业性教育发展的内在需求。清华大学根据自身的特点,实施“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育”,按学科大类培养本科生,目前经管学院、理学院、信息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机械学院、航天航空学院、美术学院的本科生等相继实施大类培养。

素质教育是我们国家针对我国新时期的国情和特点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教育理念,并将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其重要的切入点,相继在一批高校中建立了“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从我们的认识角度来看,文化素质教育有别于通识教育,通识教育解决的是知识的“识”的问题,更多地面向知识结构的调整;而文化素质教育解决的是素质的“质”的问题,更多地面向为学为人的素质内化。在我校,从1990年代以来,我们针对我校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所作的重要教学改进工作之一,就是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在提高学生全面素质方面的基

础性地位,体现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在本科生培养方案中规定了13个学分的文化素质教育课程的基础上,本学期,我们又设立了名为《清华大学新人文讲座》的《文化素质教育讲座》课程,并以必修1个学分(听8讲+一个报告)的方式列入了2008级本科培养方案,我校一批院士、名师、著名学者纷纷登台主讲,校长顾秉林院士、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院士都亲自为学生作了讲座。在这一系列新人文讲座中,清华大学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文化,学生身边的院士和大师们的科学精神、人文风采、为学为人的风范,对学生产生强烈的影响和感染,讲座结束后还有长时间的师生交流互动,确实可以取得内化的实效。今后我们仍然会着力加强文化素质教育课程体系的建设,探索具有内化实效的教学模式,努力建设好一批高质量的文化素质教育核心课程。总之,在知识社会和全球化特征日益凸现的时代,人才培养是个世界性议题。我们希望通过共同的讨论,能努力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把握世界高等教育潮流、继承各自学校传统和特色,主动改革,切实提高高等教育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水平。

[本文是作者2008年11月20日在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的发言]

[责任编辑:杨裕南]

(上接第6页)

四、理念是先导

理念是先导,这也是我们进行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进程中大家的创造发明。20世纪90年代初,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改革的进程中开展了教育思想的大讨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很多大学都纷纷向他们学习。就此我曾经说过,“一场教育思想观念的大讨论在全国悄然掀起”。思想观念非常重要,没有先进的教育思想,就不可能有先进的高等教育。2007年底在讨论建设高等教育强国时,多位大学校长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必须以现代化的教育思想为指导。现在,高等教育界的教育观念思想大讨论仍在继续深入进行。今天来参加这个论坛来的代表很多,很多人都希望在这个论坛上能获取新的思想观点、新的思维。大家都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观念、思想,比如素质教育思想,就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的理念。我们为什么讲素质?过去提两个要素——知识、能力,后来提出三要素——知识、能力、素质。我曾到阎锡山老家参观,他早就提出来过“知识、能力、人格”三要素。

他也觉得“知识、能力”两个要素不够。现在大家总爱讲“提高全民族的素质”。素质是什么?当时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素质是人的知识和能力内化为人的隐蔽性的品格》的文章,阐述了我的看法。多年来,我们开展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素质教育,大家都有了共识。南开大学开设了10门理工科的科学素质教育课程,如数学文化、环境伦理文化等,这些课程讲得非常生动,去学习的人很多,国内外都有人邀请他们去讲。这说明文化素质教育还在深入。文化素质教育与一般的知识教育不一样,它深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提高的是素质,是一种稳定的品格,不是给学生一点知识,甚至也不是只培养学生一点能力。这算不算中国的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我们应该坚持努力不断地去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因为本科教育是基础,我们一直很重视。今天由于时间关系这里就不展开了。

[本文是作者2008年11月20日在南京举行的首届“中国大学教学论坛”上的讲话录音整理稿]

[责任编辑:杨裕南]